

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石家河考古队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一、调查工作的学术基础、目的和经过

石家河遗址群位于湖北省天门县石家河镇境内（图一）。其田野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

1954年冬，天门、京山两县联合修建石龙水库干渠。在开挖到天门县石家河镇地段时，于贯平堰（今杨家湾村）东南、三房湾村东、昌门冲村北等地点发现大量石器、陶器等古代遗存。翌年，湖北省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在这个地区进行了首次调查，并发掘了罗家柏岭、贯平堰、石板冲和三房湾四个地点。其中尤以罗家柏岭的发掘面积为大，达1400平方米。初步确认这一带遗址分布广泛，堆积丰厚，是一处大型遗址群落，其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延至周代^[1]。

但是，自此以后直到70年代后期，除了1958年地方文物普查以外，石家河遗址群再无新的考古工作。

从70年代后期开始，石家河遗址群的田野考古工作重新开展。1978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试掘邓家湾遗址。1982年和1984年的两次文物普查皆涉及这一地区。1982年，湖北省博物馆在土城、谭家岭、邓家湾进行了小规模发掘。1987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再度联合发掘了邓家湾遗址。



图一 石家河遗址群位置图

但是,以上发掘的面积都比较小,不足以充分了解整个遗址群的情况。鉴于石家河遗址群面积广大,遗址分布密集,加之地理位置适中,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为了进一步揭示江汉平原史前文化的面貌、发展过程和聚落形态等重要问题,经商定,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于1987年秋季开始,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土城、谭家岭、邓家湾和肖家屋脊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发掘^[2]。与此同时,考古队还在遗址群上进行过多次田野踏查工作。

在这些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古代遗存获得以下几项主要认识:

(1) 现代石家河镇以北海拔30~45米约8平方千米范围以内,古代遗址的分布十分密集,很多遗址之间的文化堆积没有明显间隔,构成一个大型聚落群体。在这个范围以外,遗址仅有零星分布。

(2) 石家河遗址群的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已就这一演进方向和大的编年框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对石家河遗址群文化面貌的认识,始于1955年罗家柏岭等四个地点的发掘,石家河文化的命名即是在此基础上得以提出的。而对石家河遗址群诸文化遗存的进一步分期,特别是陶器的编年,则是在1987年邓家湾、谭家岭和肖家屋脊三个地点的发掘与整理的基础上才开始的。其结果是将这三个地点的陶器统一分成8期。其中1~3期属大溪文化或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的遗存,4、5两期为屈家岭文化,6~8期则被定为石家河文化早、中、晚期^[3]。这一分期基本上反映了我们对石家河遗址群陶器编年的初步认识。如果说这一对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的陶器分期是对过去研究的补充和发展的话,那么此次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分期则是对本文化得以命名的典型遗存进行直接研究的首次尝试。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研究的初步性,这项分期结果自然容有进一步检讨的余地。单以简报划分的6~8期而言,可以明显看出6期与7期之间的差别远较7期与8期之间的差别为小。若将6、7期合并为一期,暂定为石家河文化早期,将8期单列为一期,暂定为石家河文化晚期,则更便于把握它们各自的特征。如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夹砂陶附加堆纹宽扁足折腹盆形鼎和三角形足釜形鼎到晚期已被夹砂或夹炭陶竖槽宽扁足直腹盆形鼎和夹炭陶凹面舌形足釜形鼎所替代;早期的深盘粗圈足豆到晚期豆盘变浅,圈足加高,且不见镂孔;早期罐类中多见泥质灰陶和灰褐陶高领弦纹罐和高领篮纹罐,晚期则为泥质红陶、夹砂灰陶、泥质黑褐陶大口短领篮纹或间断绳纹鼓肩罐和高领扁腹罐;早期常见的环足鼎、大口圈足杯、高圈足杯、圈足碗、漏斗状擂钵、腰鼓状罐、泥质红陶鬲、粗矮红陶杯、轮制红陶小钵、折腹壶形器、各种卷沿盆、素面或弦纹刻符缸、篮纹缸、折腹小平底缸以及大量陶塑小动物已不见或基本不见于晚期,却新出现了圆锥足鼎、带箍细柄浅盘豆、大圈足盘、平底碗、孟、敛口瓮、叶脉纹瓮、灰陶盃等新的器类。以上早晚两期的划分,尽管尚嫌粗略,但毕竟为我们后来的工作建立了基点。

(3) 石家河遗址群各期遗存中, 尤以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者最为丰富而普遍。自石家河文化以后, 当地文化衰微, 只有局部地点的堆积, 因此前者自然成为我们的重点研究对象。

(4) 据传在过去的土城遗址发掘中, 曾发现过城墙遗迹和打破城墙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瓮棺^①。因此, 我们也一度将土城遗址视为石家河遗址群可能的中心部分。但经过1989年对该遗址再次发掘, 我们倾向于否定这一可能性而认为有重新考虑聚落群体内部结构之必要。

(5) 经过多次发掘, 清理了大量遗迹现象之后, 我们对石家河遗址群的文化堆积、房屋结构形式和建筑技术、墓葬埋葬方式和葬具等摸索出若干规律性认识。如大面积的夹粗砂大型陶器残片、红烧土、磨圆度甚高的小石子和纯净黏土堆积等皆与房屋建筑遗迹有关, 包含大量生活遗物的灰土堆积可能是居住区的边缘, 若采集到大型的小口高领瓮则极有可能与瓮棺葬有关等等。这些知识成为我们本次调查中认识和理解遗址的依据。

随着石家河遗址群文化编年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我们日益感到研究以及如何研究这样大面积的遗址群中各遗址或地点的时空分布和联系、生产活动内容和生产组织、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 即石家河聚落群体存在方式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就这一问题试图作出某种程度的了解和为今后的田野工作提供若干决策依据, 也就是我们此次调查的目的。

因此, 本次调查不同于出于文物保护目的的普查, 也不同于通常进行的旨在了解文化面貌的区域考古调查。我们的调查是在过去工作中所获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也是本次调查的一个最大特点。为了达到了解石家河遗址群聚落形态内容的目的, 全面综合考虑各种现象无疑是调查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为此我们曾设计和运用了一些调查方法。但是, 在高度开发的农业地区, 地表所能反映出来的地下遗址情况十分有限, 加上设备简单, 特别是受到我们学识能力的限制, 有的方法的效果不甚理想。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为了推动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我们还是在本报告中把它们介绍出来, 希望引起同志们的兴趣。

本次调查工作是在严文明先生的指导下, 由考古队责成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赵辉、张弛同志进行的, 荆州地区博物馆贾汉清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调查工作分1990年春季和1991年春季两次完成。在田野工作行将结束时, 以严文明先生为首的考古队主要成员就调查中发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在现场进行了数天论证研究。资料的整理和编写调查报告由赵辉、张弛同志负责, 严文明先生审阅了全文。在整个调查期间, 我们始终得到全队成员的通力合作, 四川大学博物馆的石应平先生为本报告的编辑发表提供了大量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① 天门市博物馆:《天门县1984年文物普查记录》, 内部资料。

二、石家河遗址群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

（一）天门县历史沿革

天门县古称竟陵。“竟陵者，陵之竟也”（《东皋杂录》），谓山陵至此终绝之意。竟陵在《禹贡》属荆州地，为古风国。春秋始有竟陵之名。据《水经注》记载，竟陵为“古郢国也。郢公辛所治，所谓郢乡矣”。战国时期为楚之竟陵邑。秦始置竟陵县。后晋、北宋时因避讳，两度改县名为景陵。后一次改名沿用至清雍正四年，为避康熙陵墓名讳，乃改景陵作天门，依县境西北有天门山而得名。1989年，改县为市^[4]。

竟陵之名虽古且一脉承传，但在历史上其地理位置可能发生过较大变动。今天的天门县治所在竟陵镇约是北周时所名。至于郢公初为竟陵故城之所在，今天已难考证。《水经注》谓“巾水出县东百九十里，西迳巾城……巾水又西，迳竟陵县北，西注扬水，谓之巾口。水西有竟陵大城，古郢国也。”明代董承叙撰的《嘉靖沔阳志》附会《水经注》的这条记载，云竟陵故城在天门县的巾港河西三里，并自称延访得之，其方隅道里与诸书合。清人亦多从此说。今人县志更肯定石家河遗址群中的土城遗址就是竟陵故城，言之凿凿。然此说颇可疑。今石家河镇东西两侧各有一发源于北部京山县自北而南流经此地的小河，分别名为巾水、扬水，与《水经注》载巾、扬二水名称吻合。但《水经注》中的扬水发源于江陵县，当在汉水以西，何以越汉水以东与巾水汇合？此矛盾一也。在《水经注》中，巾水自东而西流向，和今天北南向的东河方向不符，矛盾二也。董承叙所谓巾港河指历史上东西二河在今石家河镇区以南交汇后的河段，并言竟陵故城在巾港河以西。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土城遗址在石家河镇北，而根据地形判断，两河也并无在镇北交汇之可能。故董承叙所谓的竟陵故城和今土城的地望不符，矛盾三也。最后，我们在土城遗址的发掘中，虽然发现过西周时期的遗存，却没有见到更晚的堆积。故土城遗址与《水经注》所载竟陵故城的年代也有出入。因此四矛盾，故可肯定土城遗址不为竟陵故城。

（二）天门县自然地理

天门县位于江汉平原中部偏北处，自西北至东依次与钟祥、京山、应城、汉川诸县接壤，从西南方向南面隔汉水和荆门市、潜江、沔阳县相望。县境东西长而南北狭。汉水支流天门河自西向东横贯中部。县内地势北高而南低。北部边境处为大洪山脉山前剥蚀低丘地带，低丘海拔200米以下，其走向在县西北方为东北—西南向，在县东北为西北—东南向，整体呈箕状，箕口面向天门县城。低丘以南系向平原过渡的剥蚀—堆积垄岗状平原，主要分布在县内北半部，海拔30~50米。垄岗主要呈南北向的掌状分布，应当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发源于北部山地的河流作用的结果。现在也有一系列源于大洪山地南麓的河流经此

地向南注入天门河。岗状平原以南即为由汉水和天门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地区，海拔一般在30米以下，地表起伏不大。因地势低洼，北部河流至此注积成一系列湖泊，再向南注入天门河。历史上，天门县“田少泽多”。由于不断围垦以及河流溃口淤积等原因，湖水面积不断缩小。据统计，自清道光年间以来，共消失大小湖泊49个^[5]。现在石家河镇以南仍有地名叫北港湖，即为其中之一。

（三）石家河镇概况

石家河遗址群所在石家河镇又名石河镇，在天门县城北约16千米处，因前述东河俗称石家河，故名。

天门县素称鱼米之乡，石家河镇更号称天门之粮仓，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区。这里人口密集，据1979年统计，全镇农业人口87710人，为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人口的近四倍。全镇自然村837个。至于遗址群主要分布所在的土城乡有农业人口1869人，分属20个自然村。村落规模一般不大，平均每村百人左右，数户至十余户，数十户者即为大村。当地人喜聚族而居，自然村每以姓氏为名，如谭家港、杨家湾等。村落分布松散，皆建在高阜处。老村房屋布局无定制，一般面向水塘、河道、低冲（因地表流水侵蚀形成的低洼地），横向排开，依地势而建。

由于常年耕作，这里的土地早已被高度开发。全镇现有耕地153750亩，绝大多数为宜于稻作的黄棕壤性第四纪黏土泥田。自然植被也基本被人工植被取代。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小麦、棉花、油菜，另有粟、高粱、玉米、豆类、薯类以及蔬菜、甘蔗、荷莲等。水田耕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为一熟田，目前普遍实行两熟制或三熟制，另有水旱轮作制。牛耕仍旧十分普遍。村落的房前屋后多植树木，计有杉、松、槐、柳、黄楝、梧桐、杨、椿等，亦普遍种竹，此外还有柑、橘、梨、桃、李、枣等果木。家庭养殖畜类主要是猪、山羊、水牛以及驴，少见马、黄牛；禽类则有鸡、鸭、鹅之属。野生动物除水禽种数较多外，余已不多见，但常见蛇，至少有毒蛇和无毒蛇两大类。水产资源还有待开发，有鱼、蚌、蚶等。家庭副业不多，仅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纺织、竹编等。各村都建有为盖房烧砖的土窑。民间还有铁匠炉、陶窑等手工作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于集市贸易。但是，最主要的生活资料，即粮食的生产仍保留着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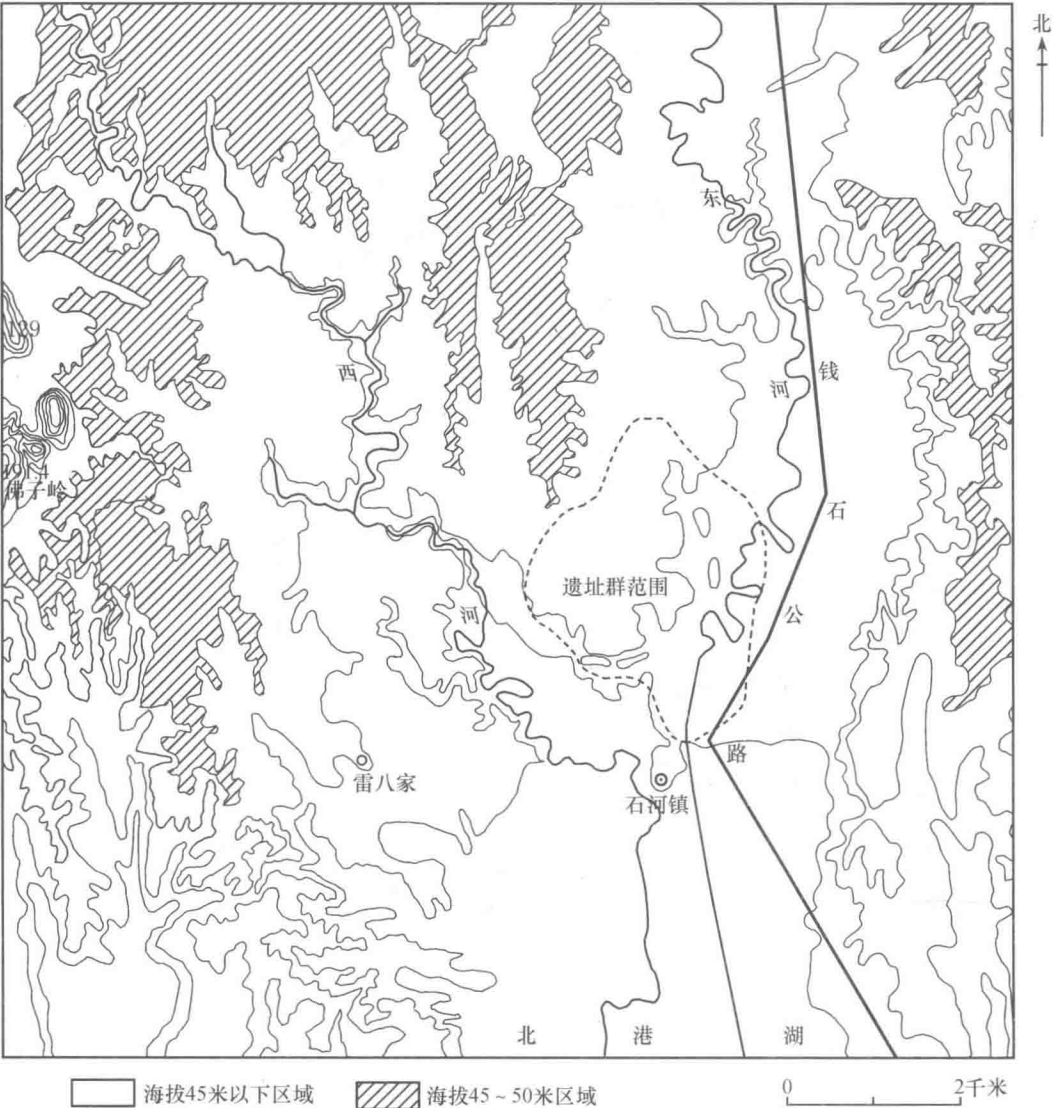
（四）石家河遗址群地貌环境和微地貌特征

1. 宏观地貌环境

遗址群所在石家河镇的北境与京山县接壤，境内恰恰包括了从北部山区山前剥蚀低丘

逐渐过渡为河湖平原的三种地貌：北部边境处有大小山头十三座，以西北方向的佛子岭最高，海拔191.4米，镇北半部垄岗起伏，十多条河流自北而南穿流而过，其中以东西二河最大，受地形限制，河流在这一带的游移摆动区域一般不大；镇南半部地势低平，湖泊众多（图二）。

石家河遗址群主要分布在镇北土城乡境内，绝大部分位于东西二河之间。其具体范围为：最南缘抵石家河镇区；北部最远的遗址在周家湾村后；西部的谭家港遗址已达西河河岸；东面遗址边界不太清楚，部分遗址，如新河、造家坟等已越过今天的东河河道，在钱石公路以东也有小面积分布。



图二 石家河遗址群地形环境

稍微宏观一些观察,整个遗址群坐落在从北面延伸过来的两条大垄岗之间的内凹部一条短垄岗的南端东侧。这些垄岗从三面环绕遗址群,它们的相对高程虽然不是太大,地形却颇起伏崎岖。遗址群南面是海拔30米以下的大面积低平地域,现在已全部辟为农田,然过去这一带的地名叫北港湖。县志记载,直到近代,这里还是一个水域较大的湖泊。虽然现在已被围垦消失,但据当地人介绍,直到70年代在这里开挖东西二河下游人工河道之前,这两条河还经常泛滥,危及这一带的田园农舍。故估计在水量丰沛的历史时期,这里是一个水域相当广阔的大湖。若以30米等高线以下区域为这个湖泊的大致范围,则遗址群的南缘和西南缘恰恰就在它的岸边。

这样一种地貌环境,为石家河的古代居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活动空间。如果更宏观一些观察,再远一些的北部山区和南面汉江以北的大片湖泊地带,更是两道更大的地理屏障。不过,这样的环境,虽然可能会给石家河地区与外界的交通带来某种程度的不便,却远不能完全隔绝它同外界的联系。而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也许正是石家河古代居民之所以选择此地居住生息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从遗址群到东侧大垄岗之间,是东河摆动冲积形成的最大一片平坦地域。从稻作农业的角度看,这里是最容易被人们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地区。遗址群西北部为垄岗状起伏地形,西南部和南面系湖泊或低湿地带,这些地区对于从事较大规模农业似有不利,却是进行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的理想场所。因此,仅从地貌反映的情况看,石家河地区十分有利于以农业为主、兼营多种内容活动的经济生活,它成为石家河遗址群的依托地,并非偶然。

2. 遗址群微地貌

现代考古学对古代遗址的微地貌观察分析日渐重视,不仅因为微地貌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古代居民的活动方式和规模,它还是我们把握遗址形状、规模和其他遗址的空间关系等问题的重要线索,而这一点对我们的调查则具有更直接的意义。因此,对遗址群的微地貌特征的考察,是我们本次调查的首要环节和主要内容。为从事这方面的分析,一张大比例尺地图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在寻找这样一张可以满足需要的地图时却遇到了困难。故自行草测了石家河遗址群的地形图,即图三。这张图虽然不甚精确,还是能够大体上反映出遗址群的基本地形特征,中心部分没有太大的误差。

石家河遗址群的海拔在30~40米等高线,局部地点超过40米,地形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微地貌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在除去东南部的遗址群大部分地区,主要为被切割得很破碎的垄岗状地形。垄岗与低冲相间,起伏较大,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山、岭”的高阜与低冲间的高差可达数米甚至十数米,且无论高阜还是低冲,皆不甚开阔。这一带的遗址往往清去表面耕土,即暴露出文化堆积。可知这里是受地表水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显然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地貌现象。在遗址群范围内,按照地形的倾斜,地表水的冲刷侵蚀主要应当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进行,形成的冲沟和沟侧岗地亦应以北西—南东走向为特征。但是,在遗址群范围里,有些沟岗的走向明显不符合这一自然侵蚀方向。在三房湾和邓家湾两块台地之间,有一狭长而直的土岭横亘在两个台地之间的低冲上,截断了低冲内原应向东南的流水方向。这条土岭在三房湾台地西南角向东90°转折,呈一曲尺状围在台地西、南两侧边缘,它明显高于内侧台地台面,使台地没有通常应当看到的缓坡边缘。这种现象在邓家湾台地的西缘和北缘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又从地形上观察,邓家湾台地原应同西北的严家山、杨家山台地连成一体,并向东南延伸到蓄树岭、杨家湾一带,三房湾台地则原本是枯柏树、堰兜子湾至石板冲、昌门冲垄岗的一部分。但是,从邓家湾台地北缘开始,沿前述土岭外侧,有一条宽大的壕沟将邓家湾和杨家山、三房湾和西侧堰兜子湾及南侧的石板冲、昌门冲台地切割开来。这些都是地势较高,原本应当连为一体的地段,壕沟却贯穿其中,显得颇不自然。这条壕沟紧贴曲尺形土岭外侧坡角,在三房湾台地西北角与土岭同时向东转折,在台地东南角和从黄金岭东侧经杨家湾东南角向西转折的壕沟隐约连通,在遗址群的中心部分围成一大半个环形。自然侵蚀是绝难形成这种现象的。从图三中还可看到,这道壕沟外侧自北向南散布着黄家山、杨家山、印信台、堰兜子湾、石板冲、昌门冲等一系列台岗,它们与壕沟以及壕沟内侧的土岭形成一种整合配套的地貌现象。此亦不可能是自然营力作用的结果。

在遗址群中部偏北处的土城台地周围,也有一周土岭,将土城台地封闭起来。土岭外侧亦有壕沟环绕台地,并将台地与北面京山坡台地的联系切断开来。这种情况与前述邓家湾、三房湾等地点的现象十分相似,唯规模较小。

位于遗址群东部的潘家岭村北和潘家岭与毛家岭之间,尚保留着一段东河故道,是东河历史上摆动改道的地貌证明。但在毛家岭台地南北两端各有一东西向槽状沟与故道垂直相交,显得极其生硬,不似流水冲刷的圆滑的河流曲道。至于罗家柏岭以下的笔直河道,已知是近年人工开挖所为。

以上地貌现象有悖于自然规律,如果不是自然营力作用的结果,则只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这种判断是否合理,以及它们形成的大致年代等问题,便引人关注了。

三、遗址调查

石家河遗址群体内各遗址或地点间并无明确的间隔,我们这里为调查、研究和叙述方便,依照过去研究沿用下来的惯称、各处微地貌的特点及文化堆积的特征,暂作如下划分。

（一）三房湾

三房湾台地位于遗址群中部偏南，其西、南两面为一条曲尺形土垣所围，南面土垣在台地东侧断掉，西面土垣向北延伸（图版一，2）。土垣西、南下临一条环形壕沟（详后）。整个台地的台面低于土垣顶部1米左右，东、北两面缓降，以一冲与谭家岭、蓄树岭台地相隔，台地顶面与冲底相对高差约4米。现有民居位于台地东北，并有土城村小学和缸窑厂位于台地西北。

三房湾台地本身依其微地貌特点可再分成三部分。土城小学所占的北面最高处，我们称之为北台。北台南有一堰塘将南部台地分成东西两块，这里暂分称为东台、西台。夹在北、东、西三台间的堰塘大概就是因为三台的堆积不断增高而逐渐形成的（图四；图版一，3）。

环绕三房湾台地西、南的曲尺形土垣现存形状为垄状，顶部宽度在10~20米，底部宽度不明，看样子应在50米左右。它与西、南两侧环形壕沟底高差一般可达6~8米。为了解土垣的堆积情况，我们在土城村缸窑厂的龙窑南侧找到一处现成的剖面。这座龙窑依土垣而建，从打破土垣的东西向小路向南将土垣西半边切去一块，切出东、南纵横两个垂直剖面。其中南剖面——三房湾P1（图五；图版一，1、3）高3.6米，底宽12米，暴露出近半的土垣横剖面。于剖面处所见之土垣可分为三个大的层次：第一层为棕黄色表土，厚20~75厘米，应为次生坡状堆积；第二层厚100~200厘米，坡状堆积。又可分为13个小层，各小层基本呈水平堆积。由上至下各小层土色分别为黄花、褐、黄花、褐、明黄、褐、明黄、褐、黄褐、褐、褐、褐、褐；第三层出露约260厘米，坡状堆积。又可分为21个小层。其上部11个小层基本呈水平堆积，下部10个小层呈坡状堆积。由上至下各小层土色分别为明黄、黄花、褐、黄花、黄、褐、红黄、褐、红黄、黄花、红黄、黄褐、黄花、黄花、褐、黄褐、褐、黄花、褐、花褐、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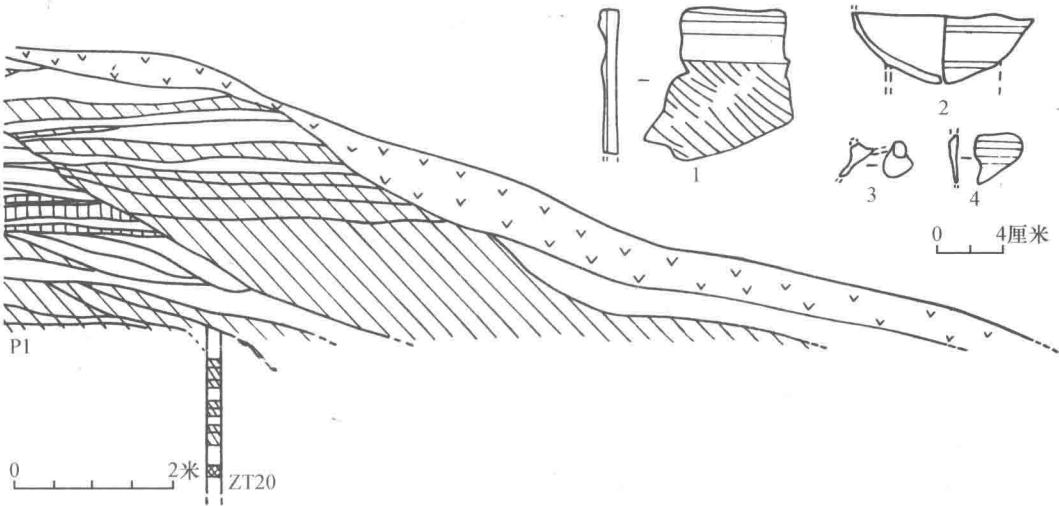
后两大层的土质像是被翻动过的原生黏土，包含物极少，偶见陶片。我们观察到的本地原生黏土，一般有红、浅黄、褐、棕褐、明黄、黄、白和灰白诸色，成片分布，均无杂色现象。这里各小层一般土色斑驳，相邻两小层的土质土色往往差别较大，或可能是将不同土色的黏土有意掺和并故意相间堆积所致。各小层堆积紧密，似经夯打踩实。这两大层显然应为土垣的原生堆积。它们各自的小层基本为水平堆积，但由小层组成的大层则为坡状堆积，说明此处的土垣至少分两次堆筑而成（就剖面暴露的情况看），但两层次没有间隔，表明这两次行为应当是一次性完成的。

在此剖面下，我们又进行了钻探（图五），钻孔深2米。可知这2米深的堆积情况与剖面第二、三两大层的堆积情况略同，惜未到底。但至少表明土垣高度应在五六米以上。

在这个剖面表土层下的原生堆积（即第二、三两大层）中，我们仅采集到数片陶



图四 三房湾遗址



图五 三房湾西侧城墙剖面P1和P1下钻探柱状剖面(ZT20)^①示意图
附P1东端南北向城墙剖面中采集陶片(图例见图一一)

① ZT代表钻探代号,下同。

片，均不能复原。陶片零星嵌于诸小层中，出土时均甚酥碎，或为夯踩时挤压所致。陶片器形有：

高领罐 肩部片，泥质灰陶，肩部有一周附加泥片上刮抹出的二、三道凸弦纹（图五，4）。

盖 顶片一，泥质黑皮灰褐胎，顶部应有三小爪纽（图五，3）。

尊（碗） 腹片，泥质磨光黑陶，似为轮制，口残，下腹饰一道凸弦纹，附加圈足残（图五，2）。

缸 口片，粗砂红陶，方唇直口，腹部拍印篮纹，剖面上可见盘筑时泥条套接的痕迹（图五，1）。

这几件陶器均应为屈家岭文化中期前后的典型器物。说明此人工堆筑土垣的年代不会早过此时。

曲尺形土垣以内的西、东、北三台堆积颇为不同。

其中西台约呈南北较长的矩形，顶面较平坦。我们在西台中央相距约60米布设ZT6和ZT7（图五）两个钻孔。它们所反映的地层堆积情况基本相同（图一一，f、g）。这里耕土层厚20~30厘米，其下文化层厚110厘米左右，为灰褐色花黏土，杂棕褐色生土粒和红烧土粒，所含陶片不多。文化层难以划分层次。文化层下生土为棕褐色黏土。当然，仅凭钻探尚不能确切了解这里地层堆积的全部状况。

我们在这里调查时，西台地表种有稀疏的小麦青苗，地表能见到的文化遗物较少。C2^①采集区（图四）内共采得陶片38片，另有未加工过的2厘米左右小石子一块。陶片数统计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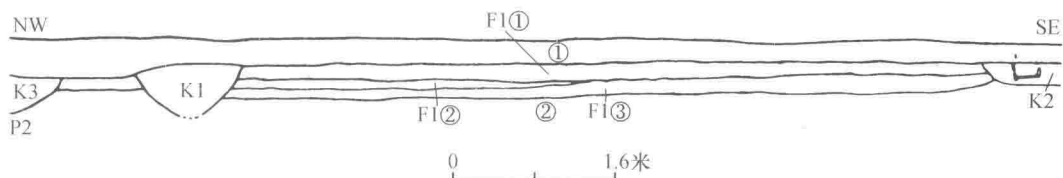
纹饰	泥质红陶	夹砂红陶	泥质灰陶
素面	2	11	25

其中仅夹砂红陶可看出器形大多为圆唇厚胎缸，泥质灰陶中有不少豆片。可知这里的文化层堆积大体应是石家河文化早期的。C2之外地表采集^②遗物亦未见有超出这一年代范围者。

西台与北台交接处，于田边可以见到耕土层下有继续的灰黑土文化层，含有较多的文化遗物。北台顶部最高处居中，很大部分压在小学房屋之下。我们在小学校东南的梯田边铲出一个长10.2米的剖面——P2（图六）。剖面处耕土层下有一坑状堆积，坑口在剖面上长约10米，其内堆积可分为三层，上两层是杂较多红烧土粒的褐色和黄色黏土，厚约25厘

① “C”为采集区代号，面积2米×5米，采集区内地表可见遗物全部采集，下同。

② 即通常所用所谓“诊断式采集”，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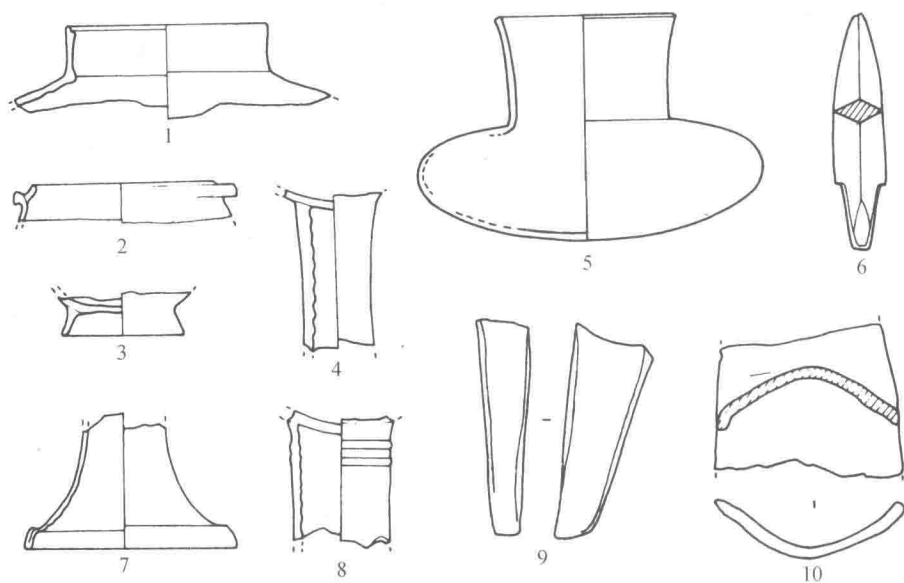
图六 三房湾地层剖面P2

米，下一层是厚约10厘米的纯红烧土。很可能是一座房屋的残基，这里暂编号为F1。它的两边均为坑（或沟）所阻断，其中K2内堆土为黄褐色黏土，剖面上可见一只夹砂红褐陶罐形器碎片，但无法复原。K3内堆土为杂较多红绕土的黄褐色花土。从这种堆积的情况来看，K2和K3不是一般的垃圾灰坑，而更像是取土坑或是这座房屋的排水沟。F1打破的文化层（即P2②）为黄黏土，杂少量小颗粒红烧土和锰结核，含文化遗物较少，厚度不明，在剖面处出露约25厘米，亦应为建筑废弃堆积。

另外，我们在小学校东侧和学校以东东西向一排民居北侧的梯田断面耕土层下分别见到两处长4米和6米的红烧土层堆积，厚度均在20厘米左右，与F1水平位置基本相同，可能也是与F1同时的房基。在小学校东侧红烧土堆积南边不远，我们还发现一个残灰坑，当时因取土平地，已将这个灰坑破坏，残余部分较少，原形状已不可知，其层位应在耕土层下。灰坑内堆土为灰黑色，杂较多炭屑及红烧土粒，我们加以清理，编号为H1。灰坑内出土陶片大多不能复原，现陶片统计如下表：

纹饰	泥质红陶	夹砂红陶	夹炭红陶	夹炭棕褐陶	泥质灰陶	夹砂灰陶	夹砂黑褐皮红胎陶
素面	23	2	23	9	81	5	12
篮纹		3				15	
凹弦纹		1			1		
凸弦纹					1		

表中泥质红陶大多是红陶杯片，还有个别较薄者像是鬲片。夹炭红、棕褐陶都应是鼎类器，个别夹砂红陶也是鼎类器。所见鼎足有两种，一种是夹炭红陶外卷舌形足（图七，10），一种是夹砂红陶方锥形足（图七，9），鼎口仅有一片，夹炭红陶，敛口，凹沿，从断面看，其做法是先做好沿，然后在沿面另加一圈泥做成口（图七，2）。绝大部分的泥质灰陶应为豆。豆柄均为轮制，柄盘分制，然后对接。所见豆柄分为粗细两种，细柄有的上部有两道凸弦纹（图七，4、8），粗柄陶胎较薄，底沿外卷成底座（图七，7）。有一件豆柄断后被磨平当做碗继续使用（图七，3）。还有个别泥质灰陶则可能是器盖，其余的夹砂红、灰素面或篮纹陶和夹砂黑褐皮红胎陶都可能是罐类。其中一件完整器为夹砂黑褐皮红胎陶，大口，方唇，长颈，扁腹，似为轮制，肩部有浅弦纹状抹痕（图七，



图七 三房湾灰坑H1出土器物

5)。另一罐口片为夹砂灰陶，斜唇直短颈，宽肩（图七，1）。此外，H1中还出有一支青灰岩石镞，镞身为扁菱形，圆铤（图七，6）。

H1中所出器物年代应为石家河文化晚期，但三房湾除H1外，我们亦未见到有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大面积文化堆积。估计北台顶部会有一些这个时期的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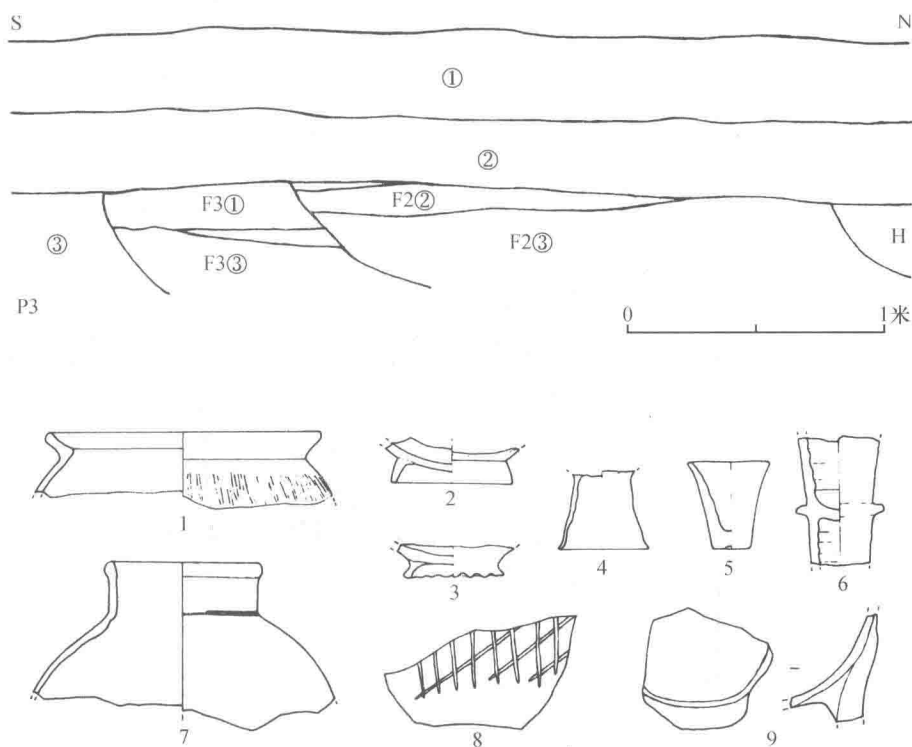
在北台与东台较低部分的交接处、南北向一排民房的东侧田边剖面上（图八，上），暴露出两座房基遗迹，顺次编号为F2和F3。剖面处出露的地层堆积厚1米，分为三层：第1层是田埂，厚30厘米；第2层是灰土，杂大量炭屑、红烧土粒和陶片，厚30厘米；第3层为黄褐色黏土，杂少量的红烧土粒，无其他包含物。两座房基即位于2层下，打破3层，其中F2打破F3，F2又被一个小坑所打破。

这两座房基的做法是一样的，都是先挖坑，后垫土。它们在剖面上暴露出来的垫土各自可分为三层。F2第1层是明黄色纯黏土，仅余厚2厘米；第2层是褐色砂质土，杂大量烧土末，最厚处尚余10厘米；第3层是明黄黏土，杂红烧土粒，出露30厘米，未到底。F3第1层为纯红烧土层，余厚18厘米；第2层为浅灰土，杂红烧土末，厚6厘米；第3层为褐色黏土，杂大量红烧土，出露26厘米，未到底。

该剖面所示的第2文化层（P3②），即灰土层，分布较为广泛，尤其是在北台的四周和北台与东台交接处及东台东侧这些较低的地方随处可见。它们大致应为同一时期的堆积。我们在P3第2层中采集到的器物主要有以下一些：

鼎足 残，夹炭陶，接腹内壁为浅灰色，足部为红色（图八，9）。

豆 盘残，泥质橙黄皮灰胎，柄为轮制（图八，4）。



图八 三房湾地层剖面P3及P3②出土器物

碗 上腹残，泥质深灰皮浅灰胎，圈足与碗底对接（图八，2）。

高领罐 下腹残，泥质深灰皮红胎，短直领，腹部拍印篮纹经抹光，在领腹交接处尚留未被抹去的篮纹印痕（图八，7）。

腰鼓罐 下腹残，夹砂灰褐陶，方唇斜沿，沿面微凹，腹部拍印篮纹（图八，1）。

插钵 残，夹砂灰褐皮红胎（图八，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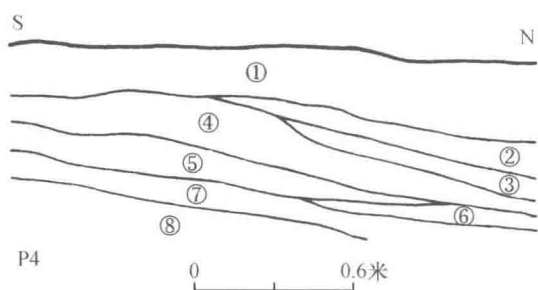
高圈杯 上下部皆残，泥质灰褐皮红胎，轮制（图八，6）。

杯 泥质红陶灰胎，平底，捏制（图八，5）。

还有花边底沿圈足一件，夹砂灰陶，可能是碗、盖一类器物（图八，3）

P3第2层所出这些器物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典型器，说明东台与北台的绝大部分灰土堆积均应生成于此时。上述几座房屋基址的年代大体亦应使用在这一时期，至少不晚于这一时期。

三房湾东台顶部最高处居中偏南。顶面为椭圆形，从地表形状来看，这个台子顶部堆积的南缘稍稍向南突破了土垣。为了解东台顶部堆积与土垣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东台顶部东侧断壁面上的台垣交接处清理了一个长2米、高70厘米的剖面——P4（图九）。P4第1层是田埂，高20~30厘米；第2层为棕褐色黏土，含大量红陶杯碎片，坡状堆积，最厚17厘米；第3层为黄黏土，杂较多白膏泥，较致密；第4层亦为黄黏土，杂少量白膏泥，稍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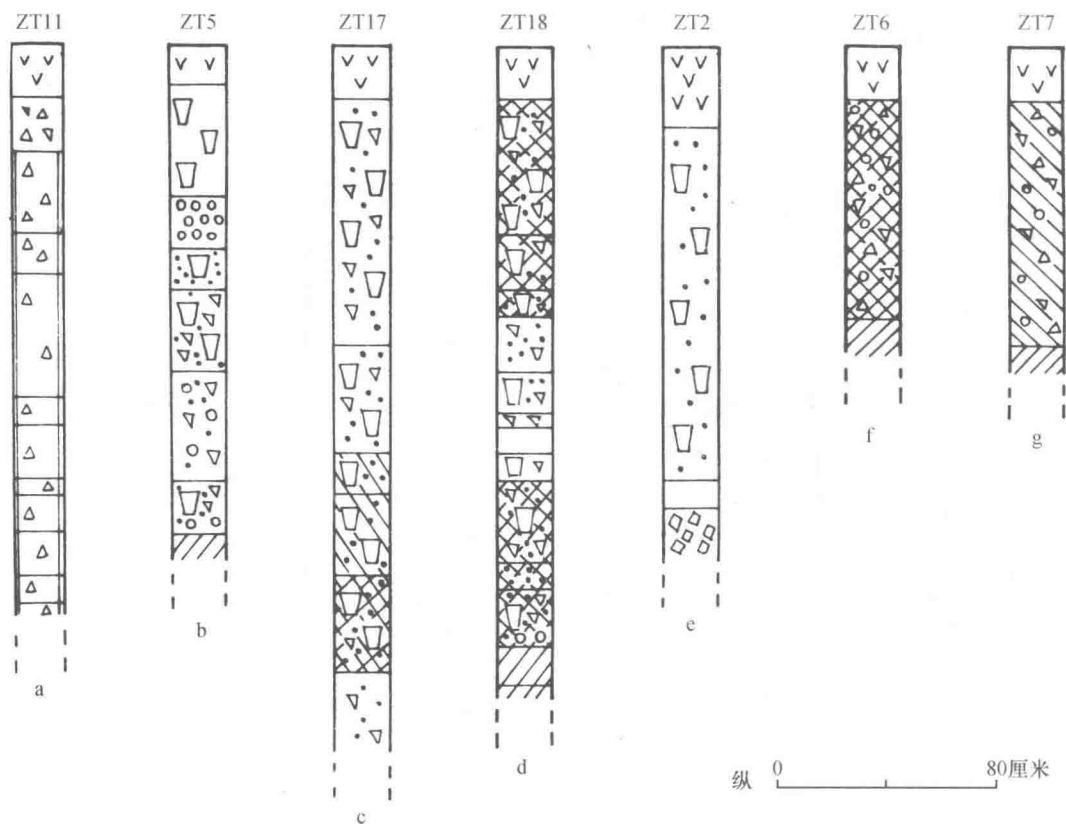


图九 三房湾地层剖面P4

松；第5层为黄黏土，杂白膏泥和棕黑色结核，较疏松；第6层为黄黏土，杂大量白膏泥和红色结核，较致密；第7层为黄黏土，杂白膏泥和少量棕黑色结核，较疏松；第8层为橙黄黏土，杂少量白膏泥，较致密，未到底。以上第3~8层亦为坡状堆积，不含文化遗物。与三房湾P1所见土垣的原生堆积结构略似，堆积用土也是相似的应为此处土垣

的主体。P4以北间隔3米的同一断面上，与P4所示相同的堆积又有出露，但P4第2层堆积层次较厚，土垣主体堆积位置较低，刚刚露头，P4第2层这种含有大量红陶杯残片的堆积遍布整个东台顶面，从田地地脚暴露出的地层来看，其范围南北70余米，东西稍长，约90米，可以证明东台顶部，至少这一层堆积是在土垣建成后才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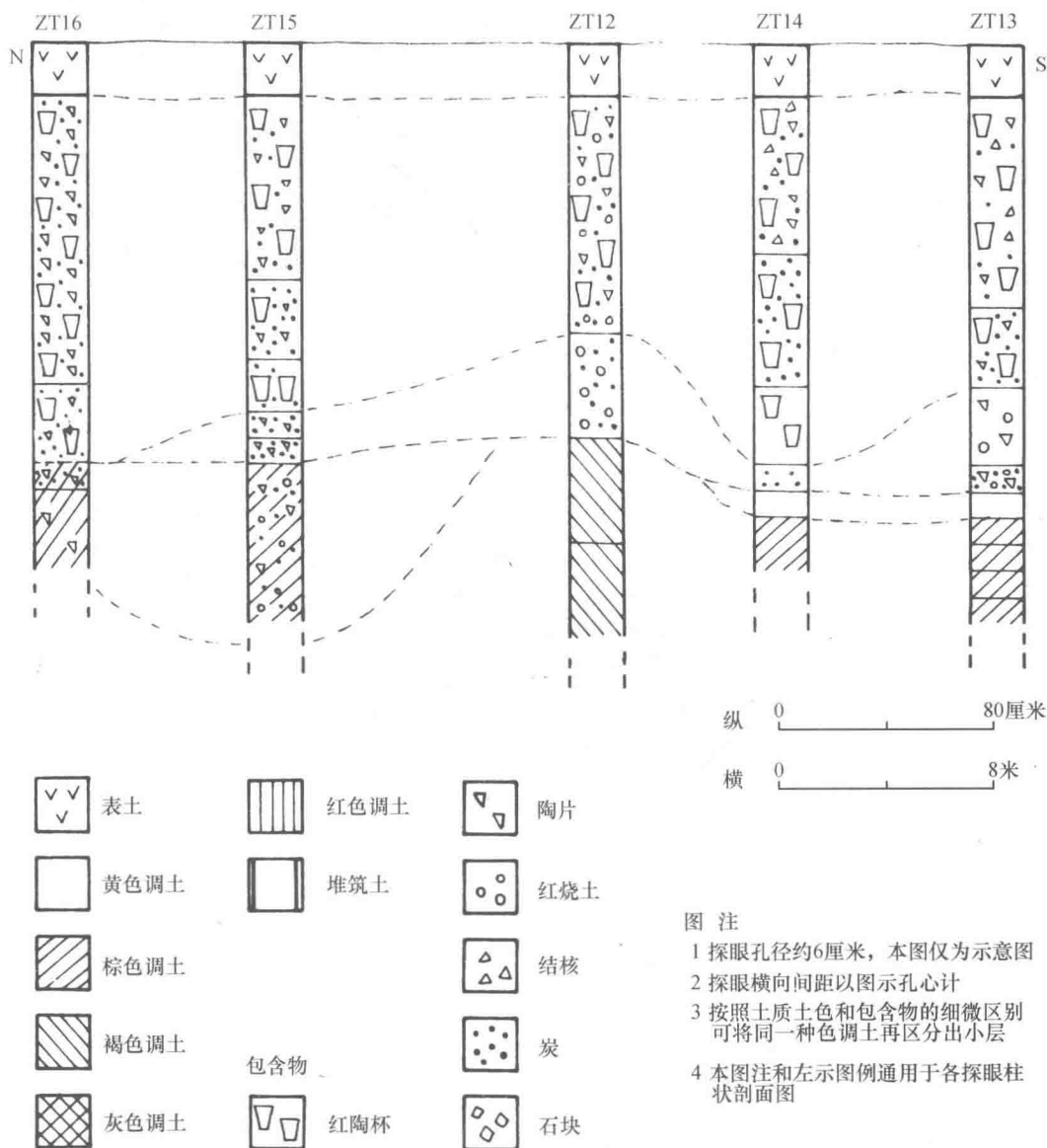
此外，我们在东台顶部堆积突破土垣的位置（图四）打钻的结果表明（图一〇，a），这里耕土层下有一层20厘米厚的文化层，其下的堆积与三房湾P1、P4所见的土垣原



图一〇 三房湾钻探柱状地层剖面示意图

生堆积相同，说明土垣在这里并未断开，只是有较薄的一层文化层漫上了土垣，造成了现在地表所见的这种现象。当然，仅凭调查手段，我们无法解漫到土垣之上的部分文化层堆积是否是被晚近的扰动所致。这个部分地表现已被开垦成水田，而在整治田地时，不能排除扰动、搬动文化层土的可能性。

为进一步了解东台顶部的文化堆积情况，我们在这里多处进行了钻探（位置见图四），兹将钻探情况列于图一〇（b、c、d、e）和图一一：



图一一 三房湾钻探柱状地层剖面示意图